宁波日报 NINGBO DAILY
9-12 理论前沿
2016年4月14日 星期四
学苑 9
责任编辑/李磊明
电话/87682861
电子信箱/llm@cnnb.com.cn

N 本期特稿

开好会议的思想及其实践基础

会风是党风的重要表现形式，也与学风、文风紧密相连。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曾写下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光辉篇章，提出了党委书记不去研究怎样把会议开好，就很难把党委“一班人”指挥好的重要论断，并对如何开好会议，实施党的正确领导，作出过一系列精辟的论述。这些经典论断论述，蕴涵着深刻的思想，对于今天改进文山会海，提高开会质量，推进党风建设，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李泽泉

毛泽东关于开好会议的几个重要思想

1、会议要少而精

我们党无论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建设年代，都面临着繁重和艰巨的工作任务，各级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不仅要作决策，还要到实地去调研，去发动和组织群众，去协调督促具体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花太多的时间开会。但开会又是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明确任务、部署工作、实施科学领导的重要方式。怎么办？在毛泽东看来，一是要少开会，开短会。要做到“会议次数不可太频繁”，不能因为会议多而干扰实际工作的进展。“每次会议时间不可太长”，不能因为会议时间长而拖宕工作。怎样做到少开会、开短会呢？毛泽东进而认为会议讨论的问题要少而精，“每次代表会议只应有一个主要的问题，此外，可以有一个两个次要的问题，讨论主要问题的时间要多些，讨论次要问题的时间要少些”。二是开会要解决实际问题。毛泽东指出，开会讨论问题一定要实际化，既要规定具体任务，又要规定完成任务的具体日子。否则，笼统地、不切实际地讨论问题，就是空洞的、官僚主义的讨论，就是白费时间和不能完成任务的会议。

2、开会要讲究技术

为了提高会议质量，毛泽东十分重视开会的技术和方法，强调“指导会议要采用很好的技术”。毛泽东强调的会议技术，主要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既要引导与会者的讨论集中到会议的预定主题上，又要善于发现与会者的创新话题，确保会议真正解决问题。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要引导群众的讨论潮流奔赴到某一问题；但有重要意义的超出题外的发展，不但不要大杀风景地去喝止他，而且要珍重地捉住这一发展的要求，介绍给大众，成立新的议题。这样会议才有兴趣，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同时会议也才真正实现了教育的意义”。第二，营造生动活泼的会风，克服呆板沉闷的会风。毛泽东认为，开会就是为了解决问题，能否解决问题是衡量会议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志，因此，营造生动活泼的会风很重要。首先要发扬会议民主，“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要“废止封建的会场秩序。共产党的会场要是反映无产阶级之积极活泼的爽快的精神，把这些做成秩序”。其次，要废止会议的党八股。毛泽东指出，呆板的会风就是开会的党八股，表现为“一开会，二报告，三讨论，四结论，五散会”。会议无论大小，都要按照这个死板的程序进行，其结果只能是为开会而开会。针对这样的党八股会风，毛泽东强烈呼吁，必须加以改革。

3、开会要准备好议题

会议的议题是会议的中心内容，在毛泽东看来，精心准备好会议议题，是反对形式主义开会，提高会议质量的重要环节。为了准备好会议议题，首先要求关注议题的实在内容，使会议议题“要有中心内容，要切切实实讨论工作中存在的为人民所关心的问题”。其次，毛泽东要求会前对议题进行充分的准备，不能临时凑合议题，会前准备议题就是“对问题的内容和环境先要调查清楚，并对于怎样解决要想一想”。为了准备好会议议题，会议的主要负责人要亲自负责。事先不准备好议题，就好像打仗时“兵马已到，粮草未备”，后果严重。因此，如果没有事先准备好议题，不要急于开会。

4、会议代表发言要有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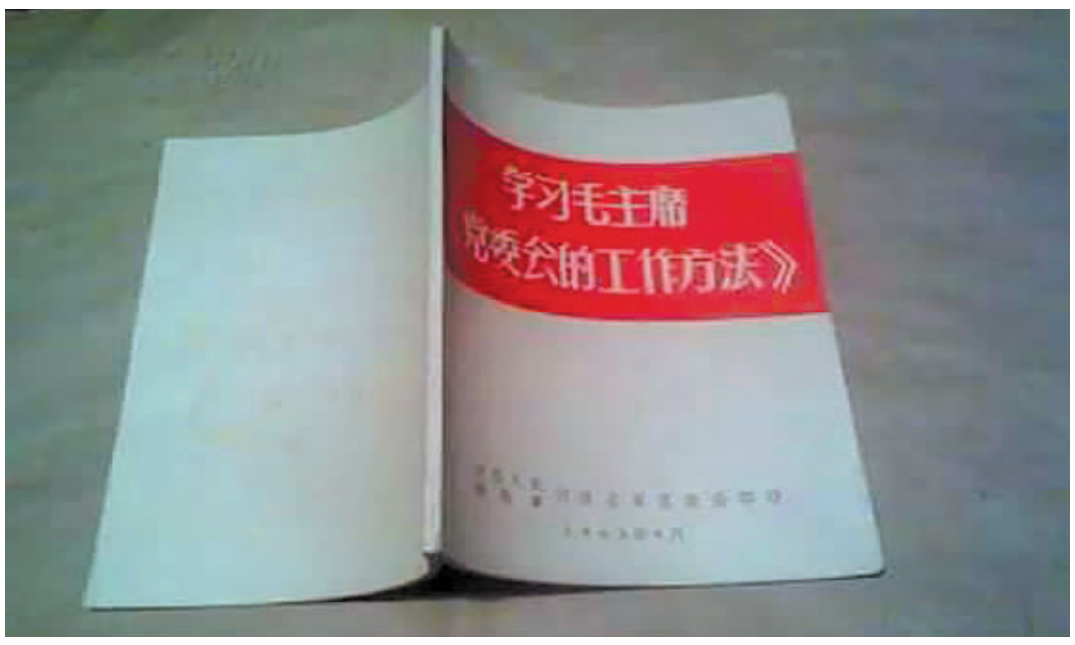
开会是为了凝聚大家的智慧。由此，与会者的发言态度和质量，是决定会议质量的重要因素。为了提高与会者的发言质量，首先要求开会要事先发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与会者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要实现材料与观点的统一，要求发言者既要有是非明确的观点，又要有丰富典型的材料，要用明确的观点去统率材料，掌握的材料要丰富，但在会上发言时只需要拿出典型的。毛泽东对分割观点与材料相统一的做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

5、会议报告要简明扼要

会议的报告是会议的主题，是会议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毛泽东高度重视会议的报告，尖锐指出“不向干部会议作精心准备的、内容文字都有斟酌的报告，而听凭到会人员无目的地杂乱无章地议论，致使会议时间延长，得不到明确而周密的结论”的现象是有害的经验主义方法，必须注意克服。怎样的报告才是好报告？毛泽东指出，一个好报告应该“写得清简节约，又具体生动，又概括”。好报告是经过会前起草、会上讨论、会后修改运用等环节形成和完善的，对此，毛泽东还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他说：“各级干部会议，必须由各地高级领导机关，在开会之前，作充分而恰当的准备，这即是事前由少数人商量（由一个人负主责），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写好成文的纲要，精心斟酌这个纲要的内容和文字（注意简明扼要，反对不着边际的长篇大论），然后向干部会议作报告，开展讨论，吸收讨论中的意见，加以补充和修改，作为定论；并将此项文件通知全党和尽可能地在报纸上公开发表。”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毛泽东做好报告开好会议的做法有过高度的评价，他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彩。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可见，毛泽东要求会议报告简明扼要，关键点在于篇幅短而精、字数少而管用。

6、会议决议要好并得到坚决执行

开会要不要作出决议？如何作出和对待决议？这些都是事关会议成功与否的重要内容，也是关系到如何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的重要之举。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等文献中，对这些问题作了科学回答。在毛泽东看来，开会不要轻易作出决议，因为“会议的决议，多不一定灵”，但是，决议“少也不一定灵”，关键是要作出好的决议。毛泽东进而对作出好的决议提出了三点具体要求：一是决议要反映实际问题，也就是对实际情况要明了；二是针对实际问题，决议要表明明确的态度，下大的决心；三是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做到方法对头。最后，毛泽东还强调，决议一经作出，就要坚决执行。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单行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社2016年2月26日电）

毛泽东关于开好会议的思想的实践基础

毛泽东关于开好会议的思想，是基于他本人参加和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历程，通过自己参加会议、主持会议、准备会议、贯彻会议精神等一系列重要实践活动而逐步形成、丰富和成熟的。在不同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为准备好会议而开展扎实有效的调查研究、在参加会议过程中积极发好言、作为主要领导虚心接受会议代表批评、亲自动手写好会议报告等构成了毛泽东关于开好会议思想的四个主要实践基础。

毛泽东之所以在开会中发好言、作出精彩报告，与他重视调查研究、开展富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分不开。通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实践，毛泽东探索出了调查研究与开好会议的关系，认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这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使发言权与调查研究划上了等号。为了做好调查研究，为开好会提供真实有用的材料，毛泽东提出了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其一，调查研究不能“走马看花”，要“下马看花”。“走马看花，不深入，还必须下马看花，过细看花”。这明确地指出了调查研究只有深入群众，深入实践，才能取得真经，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其二，调查研究要运用矛盾分析法。毛泽东指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运用矛盾分析法就是要全面了解主客观世界，针对不同的情况寻找和研究不同的解决措施，提出有针对性的好建议。最后，毛泽东还提出了做好调查研究要有正确的态度，这就是“亲自出马”的态度、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在毛泽东看来，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深入实践，关键是要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在参加会议过程中发好言，是毛泽东关于开好会议的思想的重要实践来源。在1935年遵义会议前，毛泽东没有处于全党全军的核心领导地位，但在苏区和长征前期参加党内的一些重要会议中，毛泽东并不因为自己不是主要领导而不认真发言，而是本着对党、对红军、对中国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顶着受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左”倾教条主义者排挤和打击的风险，勇于发言，敢于争论，坚决维护真理。在1927年8月7日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尽管不是中央负责人，也不是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而是作为湖南省的代表参加会议，但出于对中国革命事业和党的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坦诚发言，除了批评陈独秀右倾错误外，对当时我党亟待解决的军事斗争和农民土地这两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实际上提出了以武装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点的建议。这些建议，尽管没有被完全采纳，但反映了毛泽东参加会议的认真态度和富有远见的卓识，为我党领导革命从以城市为中心转向以农村为中心奠定了思想基础。在1935年长征途中举行的在党的历史上具有生死攸关转折点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基于前期的深入调查研究，作了长篇发言，对当时中央的总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由于毛泽东的发言反映了当时我军广大官兵的心声，把握了当时军事斗争的规律，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和支持，使会议通过了正确的决议，解决了当时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正确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在危难之中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作为主要领导虚心接受会议代表批评，是毛泽东关于开好会议的思想又一重大实践基础。1962年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当原定会议时间结束时，由于不少会议代表反映会议时间太短，还有许多话希望在会上讲，毛泽东提议延长会期，让参会人员都在北京过春节，“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由此大会进入第二阶段，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是地方来的同志向中央特别是向省、市、自治区党委提意见。毛泽东带头作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由于毛泽东带头作了自我批评，中央其他领导也作了自我批评，使与会者消除了顾虑，在小组讨论发言中，积极当面对中央、对上级提出了批评意见，直抒已见；许多被批评者也坦诚接受，恳切道歉，真诚地作自我批评。使这次大会洋溢着民主和宽松气氛，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重大成果，对推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

亲自动手写好会议报告和讲话，是毛泽东关于开好会议思想的重要实践活动。毛泽东反复强调“自己的文章自己写”，这是毛泽东对自己开会作报告的概括，对此他有过具体的解释和说明，这就是：坚持自己写自己的报告和讲话，而不用别人包括自己的所谓朋友、秘书和管辖范围内的同志代替。毛泽东曾明确指出，领导干部让别人代写文章是很危险的。毛泽东参加和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生，可以说也是写报告、写讲话和写文章的一生。在湖南的湘水之滨，在井冈山八角楼的煤油灯下，在红军长征的漫漫征途上，在陕北黄土高原的窑洞里，在北京中南海的办公室内，他写下了许多动员和教育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而奋斗的鸿篇巨著。这些报告、讲话和文章不仅在内容上准确地完整地表达我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原则和政策策略，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而且其写作风格大都表现出毛泽东特有的“理直气壮，舍我其谁”的革命家气势、“理从事出，片言成典”的思想家风度、“用典丰富，随手拈来”的学者式积累和“典雅、通俗、幽默”的个性化语言。

（作者为浙江科技学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中心主任）

相关链接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是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3月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时总结讲话的一部分，系统阐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并将其概括为十二条，是一篇加强党委领导班子建设、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光辉文献。

从那时到现在已过去半个多世纪，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的基本思想历久弥新，对于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学习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学习掌握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面加强党委（党组）领导班子的思想政治建设、作风建设和能力建设，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仍然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新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就学习毛泽东同志《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作出重要批示，对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重温这篇著作提出明确要求。不久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加强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建设的通知》指出，各级党委(党组)要充分认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的深刻意义，把《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纳入“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重要内容。

N 高端声音

科学认识经济新常态下的速度变化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指出，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向更高发展水平跃升的必经阶段。从长期看，一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呈现出一定规律性，即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助推经济较快增长的“低垂的果子”会逐渐减少，经济发展在更高阶段上只能取得相对较低的增长速度。

有关测算表明，不考虑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增长，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从1978年—2010年的年均10%左右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7.6%，并将继续下降到“十三五”时期的6.2%。如果考虑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增长，“十三五”时期潜在增长率则要高于6.2%。但潜在增长率是指一定时期由资源要素供给能力、生产效率和发展模式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仅代表了一种增长的可能性，既不是实际增长率，也不是会自动实现的增长率。

我国经济从高速转向中高速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只有深入把握潜在增长率下降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主动作为、积极施策，才能成功实现增长阶段的平稳转换。

“开前门、关后门、修围墙”做好债务风险防范

财政部财科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认为，目前中国金融市场并不存在系统性风险。经济下行压力下，银行出现一定的不良率、企业资金链紧张，这些现象是正常的。因此，政府阶段性适当增加财政赤字是有必要的。目前，我国公共部门赤字率和负债率在国际仍处于较低水平，虽然自己跟自己比是上升了，但仍处于安全区。关键是要通过“开前门、关后门、修围墙”，规范管理政府债务，做好债务风险防范。

对于评级机构所担心的金融市场风险，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稳定市场的举措，有效避免了系统性风险。比如，通过债转股等方式，有效消化一些金融风险因素。事实上，对于每个经济体而言，其金融市场始终都存在一些风险因素，我们要做的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步伐在加快，通过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淘汰落后产能，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经济增长、实现市场稳定。如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应在逐步释放，消费、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对于评级机构所指出的问题，我们可以关注，但不能因此丧失信心。

新常态下经济工作要摆脱惯性思维和路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说，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过去习以为常并行之有效的大规模投资、“铺摊子”发展制造业、以生产要素高投入驱动经济发展的老套路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新变化。一些干部有了增速换挡的焦虑，也有人感受到了动力转换的艰难和工作办法的匮乏，这主要是因为工作思路的转换还不到位。只有摆脱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大力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才能在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大潮中成为佼佼者。

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运行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增速换挡，从2010年的10.6%回落到2015年的6.9%。与此同时，工业品出厂价格持续回落，至去年12月已连续46个月下降；工业企业利润下降，亏损面扩大；财政收入增速放缓，金融领域风险点增多。经济下行及由此带来的挑战和风险，有外部性、周期性影响的因素，但主要是内生性、结构性问题，根本上是因为供需结构失衡、有效供给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从供给侧看，受到体制机制的制约，过去一个时期“井喷式”扩张形成的庞大生产能力难以跟上市场需求变化的节奏。一方面，煤炭、钢铁、油气、有色和建材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另一方面，市场需要的高品质和个性化消费品供给不足，出现了到境外大量采购商品的现象。这些现象表明，供给侧调整明显滞后于需求侧变化，无效供给过多，有效供给不足，供需结构错配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因此，必须将经济工作重心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更加注重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供需结构失衡，重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